

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CES)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文辑

WTO与中国： 走经济全球化 发展之路

文贯中 郑志海 主编
王新奎 左学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CES)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文辑

WTO与中国： 走经济全球化 发展之路

文贯中 郑志海 主编
王新奎 左学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WTO 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文贯中等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2000 年年会文辑)

ISBN 7-300-03826-3/F·1150

I. W...

II. 文...

III. ①经济一体化-影响-经济-中国-文集 ②经济一体化-对策-中国-文集

IV. F1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0553 号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2000 年年会文辑

WTO 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

文贯中 郑志海 王新奎 左学金 主 编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62515351 门市部：62514148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c3.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32.75 插页 2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52 000

定价：5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一、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之路是百年经验之总结

自从欧风东渐以来，一直傲视东亚的中国，有数百年之久难以接受中华文化、制度并非世间最优的事实。虽然执政者一直在摸索一条在异国强势文明直逼家门的时代如何自处之道，令人扼腕痛惜的是，正当世界逐渐走向全球化之际，为政者却选择了一条闭关自守的道路，使朝野上下形成一种固步自封、孤芳自赏的心态，沉湎于对显赫往昔的留恋，而疏于对世界潮流的洞察。本以为天朝大国，关起门来，世界奈何我不得。不料就在这短短几百年间，世界科技、文化、社会制度突飞猛进。相形之下，一个曾在许多领域领先世界的泱泱大国，竟沦为世界最贫困、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处处被动、挨打，并成为李约瑟博士终生想要破解的千古之谜。

中国在 20 世纪中叶之后的奋起，改写了世界的政治地图，但在经济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仍是微不足道的，其原因是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直到 20 年前中国才从一系列的惨重挫折中悟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在十年动乱的沉重阴影尚未从神州大地消退之时，便以超人的胆识提出改革开放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他的远见卓识引导中国从自我摧毁、自我崩溃的边缘走了出来，并通过大刀阔斧改革经济、社会体制使中国在过去的 20 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又郑重决定加入世贸组织，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这一决策的深远影响只有几十年之后，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之时，才能深刻体会。

世贸组织的框架基于国际经济学的深厚理论，旨在促进和规范各国间以市场经济为原则，在和平的环境中和对等的条件下，通过市场上的竞争，而不是战场上的掠夺，分享世界的各种资源、知识和技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各国可避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赤裸裸的占领和奴役，也可避免再度蒙受世界大战的惨烈痛苦，通过发挥各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在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资本、技术充足，或自然资源充足的民族，可以出口它们的资本、技术或自然资源密集的产品，换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因此可在不用向外扩张或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比本国廉价的资本、技术和天然资源。

各国加入到经济全球化中去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其中一条基本的理由就是在各国资源分布极为不平均的既定前提下，如何在制度化的安排下和平分享世界资源。在当代条件下，不可能通过向外扩张领土，或大规模向外移民来获得国际资源。以人均资源计算，如人均水资源、人均耕地、人均森林拥有率、人均石油拥有率等，中国永远是一个穷国。要以这样的人均资源关起门来搞建设，以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只能是个美丽的梦想。这是因为其他民族有足够的智慧继续走经济全球化的道路，使世界平均生活水平继续快速提高而中国则可望而不可及。其间，中国的生态会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恶化，部分人口会不可避免地继续边缘化，这就是为什么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之路是一条正确的、和平的、互利的、可持续发展的、也是惟一可行的发展之路，只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成为经济强国是指日可待的。

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崛起的强国由于引起全球利益交割的消长，一般总会遇到现存强权的反弹。作为拥有近 13 亿人口和独特文明传统的东亚大国，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外界阻力是不难想像的，幻想阻力的自动消失是不切实际的。历史证明，如何化解外界阻力主要取决于本国的应对机制，这是因为弱国在崛起之前，无力改变国际规则。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国策就是要使中国建立起一种有利于化解外界阻力的应对机制，包括改革不合时代潮流的传统陋习，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内外的机遇，集中精力于国内的建设，并与正在快速全球化的各国经济体系之间建立良性互动，使阻力更易化解。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乃至政治体制，必须作出相应的有时甚至是大幅度的调整，才能适应世贸组织中的新比赛规则。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面临着一系列的攻坚战。同时，在一部分政府部门和一部分民众中，对中国究竟是否应以更大幅度加入世界体系，在认识上还存在种种困惑和疑虑。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和应对之道，对凝聚全民的力量，提高各阶层民众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共识，极为有益。针对不少人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种种困惑和疑虑，有必要对时代的本质特征和世界总趋势作进一步的探讨。经济全球化并不始于今日，但是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每个角落。对这样一种席卷一切的历史潮流，它对中国的经济领域的各种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以及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必须权衡利弊得失，为了子孙万代的福祉，舍得付出一些短期的代价。

这里，历史的教训是不应轻忘的。各个民族在今日世界上的地位无不因其过去对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所持的态度和应对的策略的不同而截然不同。有些拒绝变革或选择错误应对策略的民族在此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的无情冲击下，不幸被开除球籍，或蒙受种种耻辱和贫困。在面对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汹涌波涛的今天，对中国在早期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像欧、美、日那样成为主要受益国，反而成为主要受害国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总结的，以免中国对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种种机遇再度失之交臂而遗憾千古。伟大的民族都善于正确地总结以往的历史教训，从而避免一再重犯错误，因循守旧，踟蹰不前，错失良机。

二、一次群英云集、百家争鸣的国际研讨会

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发起，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世界银行、浦东新区对外交流中心，以及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题为“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之路：中国在新世纪的机遇与挑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于2000年7月5~7日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举行。这次会议举行之际正值两个世纪与两个千年之交，中国将正式加盟世贸组织，举国上下正为此未雨绸缪、献计献策。因此，这次大会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兴趣。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位于浦东一边，紧贴水深流缓的黄浦江，周围连片的超现代化摩天高楼在夏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象征着中国参加新一轮全球化的最新成果。而浦江对岸则是中国当年被迫卷进早期全球化浪潮时期留下的充满异国情调和殖民风格的大厦。与会代表在参加会议之余，面对辽阔江面上越洋而来的巨轮和穿梭往返的小艇，以及浦江两岸恍如隔世的高楼大厦，感慨万千，对全球化的不可阻挡，对迅速学会驾驭全球化浪潮，以免错失良机的紧迫性加深理解。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近200位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的官员、学者和专家，包括刚卸任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芝加哥大学D·盖尔·约翰逊教授(D. Gale Johnson)，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厉无畏，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郑志海，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安德，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博士，上海外贸学院院长王新奎博士，世行代表威尔·马丁(Will Martin)博士，亚行代表、高级经济学家马铎(Srinivasa Madhur)博士，苏黎世财经服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韩大卫(David Hale)博士，剑桥大学大卫·华尔(David Wall)教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胡永泰博士，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郑国汉博士，英国石油公司驻沪首席代表约翰·摩根(John Morgan)先生，中国在线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尧丽玲(Lyric Hughes)，韩国延世大学李斗远教授和郑永禄教授，中国台湾“中华欧亚教育基金会”范锦明研究员和陈伯龄专员等。国内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樊纲、卢迈、张维迎、王志乐、梁艳芬、陆德明、盛洪、曹思源、华民、张军、姜波克、张幼文等也出席了会议，特约代表复旦大学教授周敦仁先生和外交

部的孙树忠研究员也出席了会议，他们都在会议上作了发人深思的精彩发言。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出席本次会议的情况空前踊跃，历届会长共 14 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陈平、孙涤、张欣、田国强、易纲、海闻、徐滇庆、张春、方星海、尹尊声、陈百助、文贯中，加上当选会长陈爱民(2000—2001 年)和李稻葵(2001—2002 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二任会长钱颖一对大会十分关心，他除了向大会提交了他与其他代表合作的论文外，还参与了大会的部分前期准备工作。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资深会员杨小凯、王一江、郑德埕、魏尚进、王燕、贾浩、车家华、朱晓冬、郝雨凡、王直、陆丁、周惠中、阎颖、宋顺锋、林双林、洪朝辉、朱天、李玲、张帆、赵耀辉、姚洋、黄益平、李海铮、董其泓、杨文艳，以及一些年轻会员和留英归来的刘民权出席了这次盛会。新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单伟健在百忙之中特地从香港飞来，在闭幕式中以如何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内幕为题作了引人入胜的精彩发言。单伟健的生动语言使与会代表对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收购过程犹如身临其境。这些平日深居书斋的书生仿佛于无声处听到了经济全球化滚滚而来的惊雷。

由于世界银行的王燕博士和马丁博士的大力推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又紧接着与世界银行的专家和各方学者于 7 月 7 日就“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什么”这一主题举行了一天的圆桌会议。出席者除了代表世行的马丁博士、王燕博士，还有世贸组织的干事理查德·艾格林(Richard Eglin)、芝加哥大学 D·盖尔·约翰逊教授，世行的托马斯·沃尔(Thomas Wahl)博士，亚洲开发银行代表马锋博士，以及易纲博士、孙涤博士、尹尊声博士、王新奎博士、左学金博士、郑志海院长、杨小凯博士、黄季琨博士、赵耀辉博士、李善同博士、周惠中博士、李海铮博士、海闻博士、黄益平博士、徐滇庆博士、魏尚进博士、郑玉歆所长、翟凡、樊明太副研究员等参加。

这次大会期间，一些国内外的著名青年经济学家利用难得聚首一堂的机会，不顾旅途的辛苦，于 7 月 4 日晚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发言者有王新奎、洪朝辉、尹尊声、田国强、张维迎、陈平、徐滇庆、樊纲、易纲、海闻、贾浩、卢迈、盛洪、郑国汉、孙涤、周敦仁、曹思源、李稻葵、张小波、王一江、文玫、董其泓等。圆桌会议上大家对经济全球化及加入世贸组织的各种利弊、影响，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场上有唇枪舌剑的辩论，有慷慨激昂的呼吁，有发人深思的国际比较。发言者热切希望中国更加繁荣、富强的拳拳之心不但流露于他们的抑扬顿挫的语调之中，更呈现于他们犀利而精辟的观察、分析之中。圆桌会议的记录稿承蒙李利明先生费心整理，已在《经济学消息报》全文刊载。经该报主编高小勇先生许可，特将原稿收入本书的附录，以供读者参考。世贸组织的干事理查德·埃格林特地为本次会议写了对中国极有参考价值的发言(见附录二)。

作为经济学人，我们希望为减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必然要经历的结构调整和体制调整的阻力，使中国能以最快的速度，付出最小的代价，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贡献我们的智慧。我们相信这种中外学术思想的交流，不但会加深中外了解，也必定会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并将进一步推动国内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三、本书内容简介

极为遗憾，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将这次大会上宣讲的部分论文汇编成集出版，供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机关参考之用。本书共分六篇。

1. 中国“入世”后的机遇与挑战。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郑志海教授在题为《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对外经贸的发展》一文中精辟地指出，经济全球化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延伸，各国经济都被纳入到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由于形成了全球市场，各国可以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突破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益。由于经济全球化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之上，形成了全球信息和交易，因此，可以实现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迅速配置和流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要求参与者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还要求开放市场。在一个全球市场体系里，经济运行的方式、惯例和规则将趋于一致。郑志海教授着重指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柄双刃剑。由于各国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竞争能力等不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得到的机遇是不平衡的，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完善的可以驾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种种约束和不利条件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由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现状。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探索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作者认为，过去 20 多年的历程，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较好地把握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从而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国内经济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全球化当中受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加入 WTO，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中国外经贸发展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国将可以在 WTO 确定的多边、稳定、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下，享受 WTO 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便利，促进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当然，中国在加入 WTO 后，在享受相应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履行中国的对外承诺，这可能给中国的外经贸带来挑战和压力。

作者还深刻地指出，21 世纪初期，中国外经贸运行所面临的市场和体制环境与过去相比将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即中国将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 WTO 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使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争取尽可能大的利益，防范和减轻可能出现的风险。为此，他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外经贸发展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所应做的调

整和改革。

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王志乐教授在题为《全球化和信息化潮流与我国企业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在世纪转换之际,世界经济正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正在全面、深刻而且势不可当地改变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场革命,就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的变化大大加速的第一个原因,是冷战结束带来了深远的经济影响,综合国力的竞争取代过去的军备竞赛,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政治障碍不复存在。第二个原因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信息化进程,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条件,数字化、网络化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加强了超国界竞争。第三个原因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整个资本市场的全球化逐步深入。经济全球化使得无国界竞争(“无限制竞争”)逐步形成。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作者最后认为,中国的企业要成长为世界性跨国公司,必须经历成长的三个阶段,即向跨国公司学习阶段、合作阶段和最后与它们既竞争又合作的阶段。

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梁艳芬教授在题为《转变观念,适应新环境——谈“入世”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首先指出,世贸组织是一个以互惠互利为基础,处理多边和诸边贸易关系的国际组织。其核心是协议,本质是契约。这些协议一方面约束各成员国政府的政策行为,另一方面则规范产品制造者、服务提供者和进出口商的商业行为。“入世”对中国的影响应当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分析。作为WTO成员的政府,首先,它将有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其次,通过WTO解决贸易矛盾和纠纷。与关贸总协定时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相比较,WTO争端解决机制更为完善和有效。第三,促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

她接着指出,在享受上述权利和机遇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将承担必要的义务。(1)应按WTO的原则办事,包括对所有WTO成员一视同仁,保持政策的透明度,以及逐步取消数量限制。(2)接受WTO的检查和监督。(3)促使中国的法律法规更加完善。

梁艳芬教授还论述了“入世”对企业的影响。她认为除了企业领导人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将发生较大的变化之外,关键是市场开放的程度不同,影响会不同;产品竞争力不同,影响也有差距。她还从关税、农业、服务业、进口和分销权方面论证了为什么在中美和中欧协议中,中方的基本权利基本得到了保障。

梁艳芬教授最后提出,中国“入世”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面对新的环境,以下三个问题值得研究和重视。(1)“入世”后,中国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都应以WTO的基本原则和市场开放为基础。中国政府既然作出了“入世”的种种承诺,就一定会履行,但不应接受那些超出WTO范围或违背WTO原则的歧视性待遇。(2)充分利用WTO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既然我们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入世,就应当把政策用足。(3)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保障机制的应用和落实,即如果外国服务业大量进入对国内服务业造成了严重损害,可以采取保护措施,但对服务业市场损害的确定以及保障措施的具体内容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美国西东大学尹尊声教授和韩国延世大学李斗远教授在题为《世界贸易争端的裁决机制及中国的对策》一文中,首先研究了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前后关于世界贸易争端规则

的变化和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系统的特征。他们认为，与其前身关贸总协定下的争端解决系统相比，WTO 贸易争端裁决系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然后，作者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可能面临的潜在贸易争端问题作了讨论，同时也分析了中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基于这些分析，作者提出了一些使中国能够更好应付大量潜在贸易争端并积极参与争端解决过程的程序。

美国沙凡那州立大学的洪朝辉教授在题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反思》一文中首先概述了发达国家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最新研究动态，分析了流行于学术界四大学派（新左派、新自由派、怀疑学派和转型学派）的基本观点。作者批判性地提出了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定义和基本评价。同时，他在文章中考察了 500 年来贸易全球化的三大阶段，纵向分析了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在三大历史阶段的不同特征。另外，文章横向比较了世界各国在三次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反应，并根据各国的反应速度、程度和方式，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半知半觉”和“不知不觉”四大类，而中国在三次全球化过程中的反应特征则分别为“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和“半知半觉”。作者在文章中最后提出，历次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五点启示是：“顺”（潮流）、“全”（方位）、“新”（思维）、“快”（速）和“深”（度）。

任职于美国科盖特大学政治学系的郝雨凡教授，向大会提交了题为《全球一体化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历史转变》的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变。1949—1978 年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受国内政治和领导人观点的影响较大，对外经济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但从 80 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国力的增强，经济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已开始明显地向经济目标倾斜。不仅对外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国际经济变动的影响，而且中国国内政治和一些国内经济政策也开始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目前中国对外经济在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下走入一个十字路口：或是大幅度全方位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国家对外贸和外资等外经活动的控制，快步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或是奉行有节制的开放，在强调开放的同时，更注重国家对外贸和外资的有效指导和管理。中国决策者应权衡以下基本问题：即如果国家放松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会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经济发展）有利还是有害？虽然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是必然趋势，但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应怎样对待西方主导的、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应该加快融入还是稳步进行？经济上的国际化是否会影响中国的未来安全？中国应该如何平衡融入国际经济与国家利益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郝雨凡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试图展示 50 年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特征，并探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变化的各种因素，中国可能面临的挑战，以及对外经济政策的可能走向。

2. “入世”与政府功能的转换。在美国得州农工大学执教多年的田国强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周晓娟合写的题为《经济全球化、中国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一文试图回答中国应该如何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一重要问题，并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他们首先论述了经济、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利弊和应如何减少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波动，以及金融危机的问题。他们探讨了这种危机到底来源于经济全球化本身，还是来源于正处于经济自由化

和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的经济体制本身的不完善这一有趣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减少风险和避免金融危机的最佳办法是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改进经济制度环境，而不是采取更多政府干预和控制的办法。尽管经济制度的改进不能完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它能减轻和缓和经济危机的程度。他们提出，经济全球化所能带来的好处是长远的，代价却是短期的。他们还回答了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各行各业的具体影响。最后，他们讨论了经济全球化和市场改革的互动关系，同时就如何减少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出他们的对策和政策性建议。他们认为减少经济波动最有效的办法是不断改进经济制度环境，使得市场能更有效地运作，以及允许民间资金在追求受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王一江教授、香港大学的白重恩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李稻葵教授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钱颖一教授在题为《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经济体制的现代化》一文中提出，当经济信息透明时，国家承诺有效税率的能力是任何一个现代经济机构的要件。该文运用了重复动态博弈理论模型来确定国家通过自我强制实现这一承诺所要求的条件。他们的论文讨论了 WTO 对国家税收承诺，以及中国经济体制现代化的积极影响，也论及自我强制体系的局限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和支兆华在题为《中国的政府改革和民营化》一文中指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个良好的微观经营机制是中国国内企业得以和国外企业竞争的关键，公有企业的民营化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一步。在民营化过程中，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变是保证民营化成功的关键。他们的论文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民营化过程中的一种政府承诺机制，那就是削减政府规模和重塑政府职能，对于公众来说这是一种可见的、可以证实的对政府自身的改革。如果这种改革足够彻底，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一种信号显示政府改革的决心，并且消除公众的疑虑。他们通过在标准的信号传递模型中加入对时间一致性的考虑，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种信号可以发生并足以确立公众的信心作了讨论。

美国克莱蒙大学政治和经济学院的冯毅教授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商学院的陈百助教授题为《中国的贸易政策与关税制定》一文在内生政策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的关税结构及其决定因素。他们的论文研究了 1996 年中国 95 个行业的关税税率。关税率的潜在决定因素来自于 1995 年行业的一系列主要描述变量，并利用一种主成分分析方法将这些变量减少为在四个主要维度的变量。第一个维度的变量包含就业结构（根据年龄、教育程度和工种进行细分）方面的信息。第二个维度的变量强调行业利润率。第三个维度的变量包括前两个成分中显著性不高的那些变量，包括总产出、外商投资、存货、销售收入和总误差。第四个维度强调两个变量：行业中的厂商数目和再生产过程中净亏损的厂商数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的筛选和根据内生贸易理论的假定得到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两位作者发现：中国的贸易政策主要取决于支持高科技产业的产业政策和使社会不稳定性最小化的社会政策。他们的论文还给出了中国加入 WTO 的政策含义。

3. “入世”与中国农业、就业、社会保险和城市化。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刚卸任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D·盖尔·约翰逊的题为《“入世”与中国农业》一文是他在全

体会议上的主题发言。他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中国农业的短、长期影响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在 5 年左右的短期之内,由于有农产品进口配额这一道屏障,即中国可对超过配额的进口征收高达 65%~77% 的关税,中国并不会被进口粮食的突然增长所淹没。但由于中国的玉米和小麦价格已经高于国际价格,所以,中国会继续进口适量的小麦和玉米。相对来讲,中国的大豆并无屏障保护,今后会有更多的问题。从长期来讲,中国参加世贸组织后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劳动和土地的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必须比土地生产率提高更快,才能既保证中国的粮食供给,又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农业生化技术的进步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前者涉及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后者涉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但是约翰逊教授对中国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持悲观态度,他认为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涉及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减少。鉴于中国保守的城市化政策和低发育的土地市场,大量农民无法进城,土地流转又不畅通,因而中国会长期存在大量的兼业农户而使中国的农业生产规模难以扩大。他呼吁中国政府正视这些问题,帮助中国农民顺利向非农产业转移,以避免城乡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

安达顺顾问公司的杨桂芳博士、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经济系李海峥教授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德分校 T. 鲁瑟福特在题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种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文中为了估计中国就业的总体变动,采用一种经过改进的 CGE 模型。他们利用劳动力市场中职位搜寻或配合模型来研究失业和就业,并将失业率变量内生。根据他们的模拟,WTO 导致的进口增加将大于出口的增加。然而,加入 WTO 后中国的总体失业率将下降近一个百分点,这种失业率的降低可能是由于进出口部门劳动密集度的结构差异引起的。虽然加入 WTO 会降低进口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但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的增加,并由此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模型的结论还表明,部门间劳动力的转移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从汽车和农业部门转移到纺织和服装部门。他们向政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就业培训,为这种部门间劳动力的转移创造良好的条件。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赵凤琴、汤姆沃、王红在题为《中国加入 WTO 后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启示》一文中指出,1999 年 11 月 15 日,中美成功签订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定。中国许诺消除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工业品,以及服务领域的贸易壁垒。协定包括大幅降低关税,大量增加大宗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如小麦、玉米和稻米),以及取消出口补贴(这对美国的稻米和玉米生产者极为重要)。另外,该协定允许农产品的私人贸易,并同意消除那些基于非科学证据的卫生检疫和植物卫生检疫(SPS)壁垒。该协议是中美农产品贸易政策的重大转变,并会对世界的粮食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他们估计了一个多地区、多产品的局部均衡模型来检验中国加入 WTO 后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方案对中国玉米、小麦和稻米市场变化的定量影响。他们认为在 WTO 规则下,有关的关税、配额和贸易体系的变化对中国和世界的粮食市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和其他农产品出口国很可能由于中国加入 WTO 而获益,因为它们将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中国市场。总体来说,中国也会从中受益,较低的粮食进口成本将会加速经济的转轨,并且降低食品的花费。但是,这些收益在不同的地区和人们之间的分配也许会不公平。

对如何利用加入世贸组织提供的良机消化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美国三一学院的文贯中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题为《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城市化和人口分布优化》一文中提出，城市化是人类通过制度变迁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增长源泉。同时，城市化是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解决失业的不二法门。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苦于只能用自己有限的耕地和资源养活巨大的人口，以致造成生态恶化、人民贫困。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也因受制于耕地的分布而极为分散，使城市化迟迟落后于世界各国。中国追求现代化转型并使社会城市化的努力虽已进行了 100 多年，但期间经历的挫折和痛苦远较其他民族为多，这与中国资源禀赋的先天缺陷是分不开的。1949 年以后政府虽大力推动工业化，但由于当时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加上奉行孤立主义的对外路线，使加速城市化的希望十分渺茫。

作者认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其社会—经济制度以来，以流动人口和乡镇企业为代表，出现了推动城市化的强大动力。可是由于中国当时尚未决定是否要全身融入世界经济，对是否能对世界粮食市场有所依赖缺乏信心，因而采取极为保守的城市化政策，既不鼓励乡镇企业迁进城区享受集聚效应，又不鼓励流动人口落户都市发展服务业，错失了大大加快城市化的良机。各国的经验表明，发展服务业是解决就业的最终手段。但是服务业的发展前提是社会的高度城市化。中国目前低下的城市化水平是服务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文贯中教授最后提出，加入世贸组织将使几个世纪以来束缚中国的两大限制条件（粮食供应和过剩人口）得以大大放松。中国因有世界粮食市场可作调剂，将不再需要迫使大部分人口务农，也不再需要靠竭泽而渔式的经营养活本国人口。中国可以放手推动城市化，并允许人口在自愿的基础上，流动到水源丰富、生态良好的地区。中国巨大的人口也能找到新的出路。中国将有机会根据其比较优势重组经济结构。世界市场可以通过大量吸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部分地吸收中国的劳力。但中国的大部分剩余劳动力预计将由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带来的服务业的快速扩张所消化。

说到就业问题，自然要讨论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世界银行的王燕、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徐滇庆、美国农业部的王直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翟凡在题为《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隐性养老金债务和转制成本——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一文中提出，中国经济改革所遇到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缺少一个有效和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世界银行 1997 年的报告指出了中国现行养老金体系的两个问题：近期的国有企业养老金负担问题和长期的由人口快速老龄化而引起的问题。今天，这两个问题变得比 3 年前更严重了。他们在考察了国际经验后，利用新近设计的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了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影响，并比较了支付隐性养老金债务和转制成本的各种选择方案。他们考察了各种改革方案对养老金体系自身可持续性和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对各种方案的模拟结果表明中国养老金体制的改革是富有希望的。

他们设想了三种情景。在基准情景下，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变缓，劳动力在 2015—2020 年间停止增长，并在此后开始下降，但是 65 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人口却在继续增加。因此，老人赡养率将从 11% 稳步上升到 2030 年的 25% 和 2050 年的 36%。养老金系统赡养率（系统赡养率）目前高达 30%，亦即三个工人赡养一个退休者。到 2030 年

系统赡养率迅速上升到 69%，到 2050 年上升到 79%。在假设情景 1 下，假定目前的体制（现收现付和名义上的个人账户（空账））保持不变。模拟结果表明目前的现收现付体系是不可持续的。扩大现行体系的覆盖面在短期可以改善财政状况，但在长期将会导致财政状况恶化。在假设情景 2 下，假定用各种税收来支付转制的成本，并在 2001 年建立起一个新的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

他们考虑了普通税、增值税、公司税和个人消费税等各种选择方案，并比较了这些方案会造成影响。转制成本在 2000—2010 年间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0.6% 左右，并在 2050 年下降到 0.3%。他们认为，使用个人所得税支付转制成本能最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轻经济的不平均程度。在注入财政资金支付转制成本后，改革后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在财务上将变得可持续。

4. “入世”与中国的银行业和金融业。原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作了题为《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的发言深思的演讲。这里收录的是他的同一主题的论文。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1）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2）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 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地区。（3）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4）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 1999 年就发生了 7 起大规模的金融兼并案。中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中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易纲呼吁有必要结合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

原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现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的孙淦在题为《加入 WTO 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进一步改革》一文中认为中国加入 WTO 已是指日可待，如何合理地应对已成为政府部门、企业主管、研究人员及媒体的争论热点。他在该文以一个简单的模型生动地描述了人们研究 WTO 给我国经济社会造成冲击时大相径庭的思路的内在逻辑。作者依据在一家国有大银行规划工作的亲历观察，提出了对中国金融服务业转型改组的一些十分中肯而及时的建议。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张春教授，以及他的合作者陈欣在题为《关于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有企业债转股中投资退出战略的分析》一文中提出，债转股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 20 世纪最后一年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中国政府认识到国有企业的大量负债已严重影响许多国企的活力和发展，希望通过将一些企业的银行债务转变成由相对独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股权，从而盘活银行不良资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同时，使这些企业轻装上阵，摆脱债务负担，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它们的发展。该文所关心的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些国企的业绩进步之后，最终应当怎样处理它们所拥

有的股权。它们既可以将股份卖给国有企业（债转股企业也可依法回购股份），也可以卖给包括国外投资者在内的私有经营者，对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也可以通过上市从而使股权广泛分散于中小投资者手中。他们从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来分析这三种选择，以及它们的相对优势和劣势。他们的分析可以提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权退出的新视点。最后，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论分析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和较具体的操作性建议。这些建议可以被用来增加企业的整体价值。

在美国苏黎世金融服务公司工作的过大江博士在题为《金融资产的证券化及其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应用》一文中主要介绍了 30 年来现代金融市场中最重要金融技术之一：金融资产证券化。该文第一部分简单介绍金融证券化的法律及经济构架，然后集中讨论了证券化最活跃的领域——银行贷款和高收益债务的证券化。随着贷款证券化的引入，使商业银行得以实现从传统的“发放并持有”到“承销及分配”的角色转变。此外，他还介绍了在贷款证券化过程中用于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数量模型。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来说，这篇文章探讨了可能运用该技术的三个领域：（1）应用于消费者信贷市场，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以住房抵押贷款担保证券（MBS）的形式完善国家住房项目融资体系，并为一般家庭购房提供急需的资金资助。（2）应用于商业及产业领域，通过贷款担保债券（CLO）的形式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并藉此减少银行贷款。使银行信用业务由传统性的“发放并持有”模式转变为现代的“承销及分配”模式。（3）应用于处理银行不良贷款，1999 年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可能约为人民币 10 000 亿元。证券化尽管也许无法解决与国有银行及企业相关的所有问题，却至少可以提供除了政府救赎之外的一个备择资本市场解决方案。

美国关键银行副总裁阎颖博士在题为《论银行资本率管理条例和银行内部风险管理》一文中回顾了国际上最重要的银行管理条例，即 1988 年巴塞尔协议和 1999 年巴塞尔资本充足率管理条例的新提议，以及美国的银行资本管理条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FDICIA）。通过对美国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过程的研究，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银行需同时满足规制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要求，但是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距。所以，她认为，应该努力将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来提高银行资本的利用率。阎颖在该文中介绍了美国银行业当前对 1999 年巴塞尔资本充足率管理条例新提议的一些最重要的反馈。这些经验和反馈对中国顺利进行金融改革，以使中国银行逐渐趋向国际银行业标准，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

在联合国担任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济事务官员多年的杨文艳女士在题为《金融危机、加入 WTO 与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文中指出，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两次重大金融危机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对银行系统脆弱性的高度重视，尤其在金融开放环境中银行系统的强弱关系到金融危机的引发和传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规定了中国开放银行业的时间表，外资银行的加入势在必行。但以目前中国银行的经营状态去和历史悠久、管理完善、资本雄厚的外资银行竞争，中国的银行获胜的希望令人担忧。加强银行系统的竞争能力、提高银行的管理和经营水平在加入世贸组织前更具有其紧迫性。作者通过比较分析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在开放银行业、吸引外资加入方面的经验，对中国深化银行改革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在美国托利多大学任教多年的张欣教授则在题为《全球化时期中国最佳通胀率》一文中,对持续增长前提下中国的最佳通胀率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政策指导思想。最佳通胀率是国际学术界长期有争议的概念。中国在最近很短时期内先后经历了高通胀和通货紧缩的事实显然说明中国也为最佳通胀率问题所困扰。作者在讨论典型理论流派对此的争论后,建立了最佳通胀率存在的理论依据及模型。以此为基础,他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通胀数据,以及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作回归分析,从而计算出中国最佳通胀率的指导值。

作者认为,最佳通胀率的科学定义应为,与一国经济长期最高平均增长率所并行,受该国国民对增长和通胀偏好制约的通胀率。最佳通胀率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常数,它随一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不同时期经济条件波动,不过有其限制范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得出,最佳通胀率值的范围是确定的,在1%~20%之间。

5. “入世”与外资、外债利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张宏霖教授在题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评价、挑战及战略》一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高速发展的一个独特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外资(FDI)。作者系统分析了大量外资涌入中国的原因,以及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的重点集中在中国吸收、利用外资的几个优势因素,包括巨大的市场,有效的外资战略及政策,大量的海外华人,以及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美国奥马哈内布拉斯加大学林双林教授在其题为《外债和经济发展——中国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一文中,探讨了外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中国应向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从发展中国家借外债的经历可以看出外债在不同的国家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例如,在韩国,外债作为投资的重要来源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而在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外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理想。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债务大国。尽管这些外债大部分是长期债务,外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中国仍应该在举借外债方面采取谨慎态度。他指出,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国应该继续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出口,避免积累大量的短期债务,高效率地利用国内的储蓄,防止资金外流。另外,中国应该重视各省外债数额相差悬殊的问题。

霍普金斯-南京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刘民权博士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许罗丹教授合作的论文题为《外商直接投资与联系效应——来自广东省的一些调查研究成果》。他们指出,自1978年至今,中国已吸收了大量的外资,近年来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他们试图回答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在帮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方面起了多大作用这一问题。作者利用于1998年在广东完成的对405家外资企业作的调查,分析了外资企业在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效应,以及人员招募方面的特点。他们同时分析了来自不同地区(海外华侨、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外资在这些方面的差别。他们的初步发现表明,四个不同组的外资在前后向联系效应和人员招募方面各有特点,但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经济及时地融入世界经济,并在打破中国在人员招募方面的各种地区分割中起了重大作用,促成了中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美国内华达大学宋顺锋教授和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张宏霖教授在题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理论与计量分析》一文中,阐述了近20年来中国在对外出口

和引进外资这两方面的发展，以及外资对出口所起的作用。两位作者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指出外商投资企业不仅直接促进中国的出口，而且还通过营销示范及技术扩散间接帮助国内企业的对外出口。他们运用 1986—1997 年省级的空间数据，回归实证了外商投资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得出外资变量的回归系数不仅都为正数，而且在统计上均十分显著，充分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确是中国对外出口的重要因素。

美国圣欧拉夫学院的张迅教授在《外资流入带来的快乐与悲伤——墨西哥的教训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一文中比较了墨西哥和中国的资本流动。在出现金融危机前，两国都经历了两个相似的经济时期：前自由化时期和后自由化时期。墨西哥经历了非常痛苦的金融危机；而中国却没有。张迅在总体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国际收支、投资证券组合的构成和资金外逃等领域比较了墨西哥和中国各自的历史数据，为中国和现在正在融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家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

国际粮农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张晓波博士和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张宏霖教授在题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不均衡》一文中提出，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关注全球化对其发展与分配的影响。他们创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实证分析方法，并用它来描述经济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生产要素对区域差异的相对贡献程度。他们以中国为例，分析了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经济开放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作用。国内资本过多地集中在沿海地区是导致区域不均衡的一个主导因素。地区间教育水平的相对较小差异则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均衡有着正面的影响。即使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全球化仍然是解释区域不均衡加剧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开放，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沿海地区有较好的吸引外资的条件，而且政府对沿海实行了极大的倾斜政策，所以沿海吸收了大量的资本。对于政府而言，进一步增加内陆开放程度则是提高经济增长，缓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的一项重要的发展策略。

6. “入世”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家都同意台湾的投资对大陆的经济有很多正面影响，但对台湾自身的影响则见仁见智。来自台湾，现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博士候选人的童振源在其题为《全球化时代台湾在大陆的投资——台湾对大陆投资对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中程评估》一文中提出，根据大陆的统计，台湾对大陆实际投资累计金额截至 1999 年底为 239 亿美元。根据台湾“陆委会”的估计，两岸双边贸易额在 1999 年为 258 亿美元。这么密切的两岸经贸交流让很多人怀疑对台湾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冲击，而且，两岸政治对抗更进一步扭曲了这些问题的本质。该文认为台湾对大陆的投资是其全球分工的一环，并提出一份对台湾经济发展影响的中程评估。结论是，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对于台湾经济发展有着正面贡献。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陆丁教授在题为《中国的产业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文中提出，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举足轻重。他的论文探讨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特点和对于产业间资源配置的影响。他认为，初步证据表明，通过改进产业政策，中国可从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获益。

在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执教多年的周惠中教授和复旦大学林丽闽教授在题为《互联与产业结构：中国电信产业浅析》一文中提出，中国电信市场实现有效竞争存在两个主要问题：政企不分的问题；网络接入与互联的问题。他们首先通过模型证明了政企不分无